

17 輯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张 鸣
 我的两次越南之行 邢志远
 孙立人案：美国在台策动兵变始末 徐宗懋
 崂山独立营抗战写真 于佐臣
 “私”是一种权利 邵 建
 梦中古城 张 兵
 冬猎琐记 宋兆麟

老照片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在法国马赛街头跳舞的中国姑娘（摄于1965年）



带孩子的少妇(1880 年摄于香港)

金伯宏 供稿



浴女(20 世纪 20 年代外国明信片)

刘巍峰 供稿

目 录

张 鸣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1
邢志远	我的两次越南之行	6
徐宗懋	孙立人案：美国在台策动兵变始末	14
于佐臣	崂山独立营抗战写真	32
徐 东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43
李 锐	想念你啊，文立徵	57
常小倩	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62
吕元贵	父亲的遗像	66
刘振峰	一辆轿车和一双鞋	69
张今慧	1951年：三八节合影	72
祁新君	雪泥鸿爪	76
岳新发	1958年荆州“除四害”	79
姜维平	一张全家福	84
郭宝文	父亲当过“文革主任”	88
史耀增	“文革”中的农科学习班	90
文 禹	没有老师的毕业照	93
王 毅	1970年秋：一支足球队	95
邵 建	“私”是一种权利	99
范 泓	大“义”灭亲	104
樊百华	难忘少年恐怖	111
金 土	最早曝光的中国灾民	116
张 兵	梦中的古城	122

老照片

吴融	武昌艺专在江津	128
杨奇璞	记母校——苏州圣光中学	134
宋兆麟	冬猎琐记	142

朱铁志	有感于《最后的格瓦拉》	153
-----	-------------------	-----

邵建	面对历史	158
----	------------	-----

《老照片》丛书

总编辑

汪稼明

副总编辑

刘传喜

总编助理

刘瑞琳

封二 带孩子的少妇（金伯宏） 插页 清末的中国妇女（金伯宏等） 封三 浴女（刘巍峰）

1949年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力辑 65） 摆弄照相机的张学良（华夫 71） 钱别留影（高建中 115） 1965年捕获的中华鲟（老屋 152）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四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须是20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E-mail: 1407f@371.net

电 话：(0531) 2060055 转 5410（编辑部）2052472（发行部）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每本书加付1元邮资）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杰

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涛

法律顾问

张红霞

凝望集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张 鸣

两个婀娜多姿的中国姑娘在街头对舞，引来了众多的围观者，姑娘头戴大草帽，一身公社“向阳花”的打扮，乍一看，会以为这是从前的哪个公社宣传队在即兴演出，然而仔细一看就不对了，怎么周围的人个个都金发高鼻，睁着怪模怪样的蓝眼睛呢？原来，这是一张“文革”前夕的旧照片，地点在法国的马赛，献艺人是参加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围观者是当地的老百姓。照片的原说明为：“参加1965年9月底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在马赛街头进行乌兰牧骑式的演出，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图为中国学生在马赛街头演出‘丰收舞’。”话说到这里，要加一点注解，所谓的乌兰牧骑是内蒙60年代兴起的一种文艺宣传演出形式，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团体被分成一个个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牧区的放牧点演出，当时是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来推广的。

如果今天有中国姑娘愿在巴黎或者马赛甚至纽约的街头即兴献舞，也许有人会扭头看上一眼，但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可那是在1965年，除了官方派出的外交官，能够走出国门来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马赛是法国的第一大港，诞生过法国国歌《马赛曲》，孕育过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很见过一些世面，什么印度的蛇舞、埃及的肚皮舞、拉美的蒙哥拉舞、百老汇的踢踏舞，统统不在话下。但是我敢说，在1965年9月底那个晴朗的日子之前，决没有任何马赛人有福分见识过中国姑娘跳的丰收舞。其实，在那个时候，马赛街头出现中国姑娘的



倩影，其本身已是很大的新闻了，更何况还有她们在街头翩翩起舞的英姿。

1965年，在大多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在它之前，中国度过了大跃进的危机，成功



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它之后，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夹在两个辉煌而轰动的“爆发”之间的1965年，似乎只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刚刚能吃上饱饭，商店里的货架上也不再空空如也的年月。那年的国庆，我所在的边境小城佳木斯还放了焰火。

可是实际上，1965年中国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了。自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要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最高层于1963和1964年接连下达两个措辞严厉的关于文艺的批示，已将文艺界推到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门口。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领袖，在游泳池边上轻轻吐出一口烟圈，已足以让人们噤若寒蝉。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稍稍露过几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迅速地从舞台和银幕上消失了。作为对领袖批示的回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横空出世，不仅伟大领袖在轻歌曼舞中被托入奥林匹亚神山之巅，还为后来遍地开花，以乌兰牧骑的形式唱响的颂歌定好了音准。

了音准。

通过查阅当年的报纸，我得知这些在法国街头且歌且舞的年轻大学生共有七人，四男三女，四个跳舞，两个唱歌，还有一个是拉手风琴伴奏的。报上说他们的节目单上，有“红绸舞”、“女

民兵”、“艰苦的岁月”、“弓舞”、“牧羊女”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丰收舞”。还演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赶着大车跑得欢》、《红梅赞》、《冬布拉》、《火车来到了戈壁滩》等当时中国的流行歌曲，演奏了手风琴曲《回忆延安》、《扭起秧歌庆丰收》以及颇为耐人寻味的法国歌曲《游击队员之歌》。不用说，在那个年月，这些节目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筛选出来的，当然还须经权威部门的严格审批。不言而喻地刻有时代的印记和挥之不去的火药味。照片所展示的“丰收舞”，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中性，其实也属于具有传统革命意义的舞蹈。1936年，当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踏进陕北苏区时，他的莱卡相机就曾经记录过由苏区工人剧团跳的“丰收舞”。这两种丰收舞向人们展示的并非农产品的丰盈以及农民丰收后的喜悦，而是象征着红色事业的壮大和燎原之势。

当然，这些中国大学生在法国的举动，还远没有达到“输出革命”的地步，虽然在维兰诺罗佩演唱法国的《游击队员之歌》时，曾有部分观众随声跟唱。据说现场有位法国人做了反感的表示——行了一个法西斯礼后退场，招来一片嘘声——显然离革命的骚动还差得远。中国大学生所做的，更多的不过是展示自己，展示自己国家昂扬的精神状况。像一家法国地方报纸说的那样，是将“从人民公社的收割到长征，所有中国人民生活的这些阶段，都优美、轻快、精确地表演出来了”。而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对伟大领袖大声的歌颂，无论是“太阳”还是“舵手”，不知道法国人体悟到了多少。我们只知道，据新华社记者说在尼姆有位老太太向中国学生要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而后又跟着演出队看下一场，说是她还有一个女儿，所以还想要一枚。

不过，我们对这些报道好像不应该全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消息，说全世界人民如何如何地热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可是后来中国革命之花并没有在亚非拉开

放。即使从那张丰收舞的照片上，我们也很难断定，围观的法国人是不是真的弄懂了中国姑娘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脸上所流露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好奇。但是，如果说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大学生们对于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革命的领袖完全没有热情，恐怕也未必是实情。那个时候，苏联的坦克还没有碾碎布拉格之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幻想还在，法共的势力尚大，比法共更左倾的青年也大有人在，如雷蒙·阿隆所说，整个知识分子群对于左翼和革命的神话还没有破灭。虽然我们的记者说法国那些上不起大剧场的人非常欣赏中国的歌舞，但更可能恰恰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对这些怀有“毛主义”理想的中国同道更有亲和感。在不久以后，当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这种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的时候，万里之遥的法国似乎也有了反应，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着实把西方世界吓了一跳，在那些上街游行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大学生中，还真有不少人手里就有那本由林彪指示编撰的“小红书”，甚至据说还有自称“红卫兵”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听法国学者巴斯蒂女士谈起的一段有关她的往事。“文革”初年，还相当年轻的她正好在北京大学教法语，在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所有的壮举后，被遣返回国。回国后，正逢“五月风暴”，原本观点激进的她却毅然成了“保皇派”，不支持占领校园的学生。我想，如果有条件将当年西方所有激进的左派学生统统派去亲身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大部分人将会变成右派。

我当然不是说法国的五月风暴与这些跳丰收舞的姑娘有关，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文化联欢节的时候，小红书还没问世，后来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学生们，也许有曾经看过“女民兵”和“丰收舞”的，可是这与他们后来的行为到底有多少关系或者没有关系都很难讲。不过，毕竟只有法国，能在几乎全世界（包

·旧事重温·

我的两次越南之行

邢志远

我先后到过越南北方两次，既不是访问、旅游，也不是留学、探亲。作为《解放军报》记者，我是随军到那里进行战地采访。一次是1965年援越抗美之战，一次是1979年我国对越自卫还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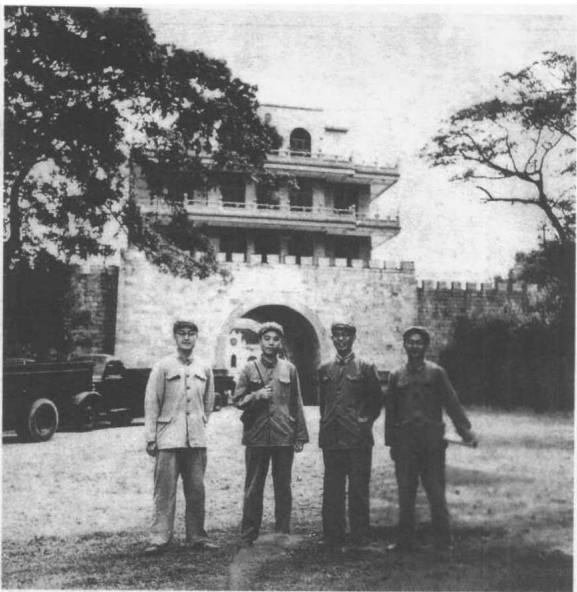
1964年，美国对越南的武装干涉不断升级，把战火从越南南方扩大到北方，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1965年上半年，应越南党政领导和胡志明主席的邀请，我国派出工程部队和防空

括前社会主义阵营）都在与中国过不去的时候，会让一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乌兰牧骑在自己的国度里满世界转，也只有法国，才会发生好像是与中国的“文革”相呼应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不管怎么说，你得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佩服法国人的肚量。

当然，我们也许更应该佩服的是那7个拎着个道具箱，在法国从南到北一共演了20多场的大学生，佩服他们演技的精湛，佩服他们意态的从容。我猜，他们可能不会是一般院校的学生，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应该是文艺院校的，至少也应该是一般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在这里，我权且充当一回整脚的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为他们报报幕：舞者——雨虹、张玉娟、陈克禹、陈丽文，歌者——范永生、热比亚，手风琴伴奏和独奏——任士荣。

我相信，他们理应健在，虽然已是双鬓染霜。而且，他们应该记得这段对他们来说并不寻常的往事。

部队，开赴越南北方，帮助该国修建铁路公路和国防工程，担负防空任务。报社指定我随炮兵 63 支队和铁道兵 1 支队进入越南。5 月份，报社还派记者处领导从北京赶到中越边境为我送行。我们在友谊关下合影留念



(见图①)。

图① 1965 年 5 月，解放军报的同志到友谊关为作者（左一）送行。

友谊关，是中

越两国友好相处的象征，也是我国无偿支援越南、运送大量人员和军用民用物资装备的重要通道之一。6 月 23 日上午，炮兵 63 支队先遣团数以百计的汽车拖着高射炮，一辆又一辆从友谊关高大雄伟的门洞中穿过。满怀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壮志豪情的干部战士，都不约而同地看手表，要牢记走出国门的庄严时刻。我出关时，恰好是上午九时整，这一刻我终生难忘！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运送援越物资的需要，我铁道兵 1 支队的任务是扩建从我广西边境到越南首都河内的铁路，把原先的两条窄轨扩建成三条轨道，以便大小火车都能通行。炮兵 63 支队各团就在铁路沿线摆开，担负保护铁路、公路桥梁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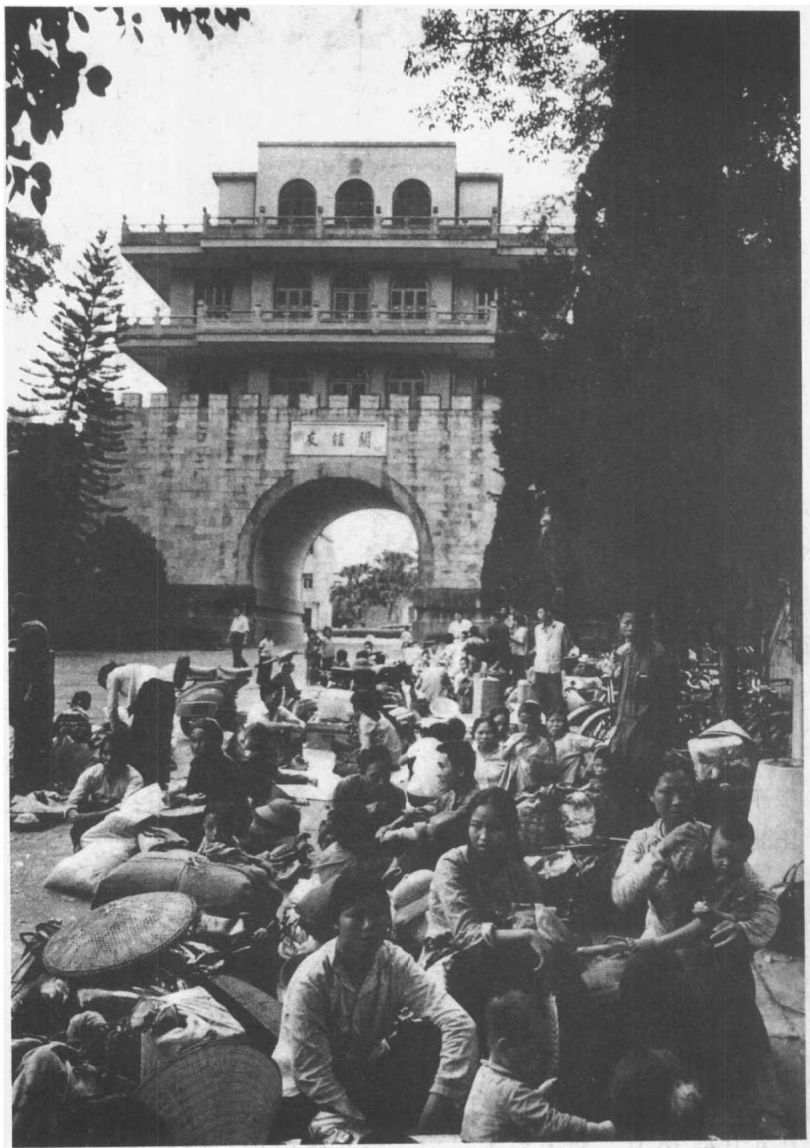
进入越南后，使我感觉最深的是越南人民对中国军人的深情厚爱。当车队经过越南边境城市同登时，道路两旁挤满了越南的妇女儿童，他们个个穿着新衣，满面笑容，热烈欢迎我军的到来。我们到达第一个驻地时已是夜间，第二天早上尚未起床，就有一



图② 1965年9月6日，作者（左）同八一电影制片厂柳奇辉（电影《地雷战》编剧）、炮兵63支队副支队长张锡璜（右）合影于越南丛林之中。

位老太太带着水果来慰问，她和我们言语不通，就摸抚着我们的衣袖，拉着我们的手，口中念念有词，像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女一样。不少越南妇女，按照他们的传统礼俗，手捧盛满茶盅的托盘，向我军献茶，并笑盈盈地看着我们把茶喝完。有一位男青年，用略带北京味的中国话同我交谈。他说他曾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亚洲学生疗养院养过病，学会了中国话，交了许多中国朋友，甚至还认识不少我的山东老乡。和我同行的，有广州部队一位画家，有一次，他在北京街头为一位七十多岁的越南老翁画像，画成后，这位老人接过画笔就题字，原来他不会说中国话，却会写中国字，而且还用“传神”二字称赞画家的作品，使我顿生敬重之心。类似的大量事实使我深深地感到，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真可谓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7、8、9月份，越南气候十分潮热。我干部战士都被火热的



图③ 1978年,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将在越南居住过几代的越籍华人驱逐至友谊关前。



图④ 1979年2月，作者（左一）随军进入越北重镇高平，与我边防某师政委李志强（左二）、师参谋长郭洪斌（左三）等人合影。

太阳暴晒得面色黝黑、挥汗如雨。衣服整天被汗水沤着，烂得很快，不少人得了皮肤病，痛痒难耐。夜间稍微凉爽些，又要警惕和防备毒蛇、蜈蚣、蚂蝗和毒蚊的攻击。多数部队住草棚和帐篷。到中午时分，帐篷

内的气温高达

46度以上，根本无法存身。有的非战斗单位，把帐篷搭在树林里，可避免太阳暴晒，但树林密不通风，也难免汗流浹背。图②是我与炮兵63支队副支队长张锡璞、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柳奇辉在帐篷前的留影。

为打击来犯的敌机，炮兵战士整天守在阵地上。有时传来“一级警报”，说敌机马上就要临空，瞄准手紧盯着空中，装填手把炮弹举在手上，只等指挥员一声令下……这样的“警报”有时一天反复响好多次，搞得大家心烦气恼，头晕脑胀，疲劳不堪。从8月到10月，我先后遭遇到8次我高射炮兵同敌机的生死搏斗。在北江、友陇、宋化，我看到过敌机被我军打得拖着黑烟狼

狈逃窜，也看到过被我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跪地求饶。当然，我看到我军的胜利，也看到过我军的挫折和干部战士的流血和牺牲。据统计，从1965年6月到1970年7月，整个抗美援朝之战，我国共出动兵力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人。我军共有



4200余人负伤，近1100人牺牲。图⑤ 1979年2月25日，作者与两位炊事兵（右一、二）在高平街头合影，可惜忘记了他们的单位和姓名。

十几个年头过去了。

经过十年动乱，1979年，我第二次奉命随军进入越南北方。原来自1975年解放了南方，实现了全国统一，越南当局为追求地区霸权，实行反华、排华政策。他们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将南北地区为抗美战争和发展当地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华人和华侨扫地出门，驱逐出境。他们将27万华人赶回中国，还把10万华人赶到海上，任其漂泊到任何一个地方，造成了震惊世界的“船民事件”。他们认为中国经过十年动乱，国力衰弱，无力对他们进行反击，便在中越边境驻扎重兵，不断挑起边境纠纷，杀害我边民，蚕食我领土。他们把我国的忍让和劝告视为软弱可欺，



图③ 1979年3月15日，我军由越南撤军，作者（右）和边防某部文化处长谢懿在水口关桥头合影。

不断地对我进行挑衅。仅1978年间，就多次入侵我国领土，打死打伤边境军民300余人，并且叫喊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1978年冬天，我又一次来到友谊关。十三年前，我军源源不断开出友谊关支援越南抗美战争。如今大量华人和华侨被越南当局逼迫通过友谊关返回祖国。我看到一批批同胞拖儿带女，衣冠不整，身无长物，来到友谊关下。他们不少人都在越南生活了几代，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同越南人民共过患难，还有不少身穿越南人民军服装，但已摘掉帽徽领章的华人，他们为解放全越南，同美国侵略者浴血奋战，如今在越南竟无立锥之地。图③即为友谊关中国一侧滞留的被越南当局驱逐的华侨。

面对越南当局的猖狂挑衅，我军忍无可忍，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随驻广西龙州的边防部队，从水口关以南山谷中的布局关出击，先头部队的坦克当天就占领